

怀梆文化 生态研究

Huaibangwenhua
Shengtaiyanjiu

丁永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怀邦文化生态研究

Huaibangwenhua
Shengtaiyanjiu

丁永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梆文化生态研究/丁永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04 - 9521 - 5

I. ①怀… II. ①丁… III. ①地方戏—研究—河南省
IV. ①J82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993 号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发展，整体性、生态性保护的理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一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文化”，它不同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如故宫、长城等。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都是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产物，与人的生活、习俗、信仰紧密相连，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和传承都是一个活态的过程。无论是音乐、舞蹈、戏剧等，还是民俗、节庆、仪式等，都是在动态中完成的，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及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整体性原则、活态传承原则、本真性原则。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除建立了国家名录体系、传承人认定保护机制等之外，又采取了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举措。

的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它的环境密切地联系着。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可以看到，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决定着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文化的改变。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中国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森林减少、草原沙化、水源枯竭等，这些在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对文化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由此可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必须保护它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

社会环境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更直接地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的迅速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迅速衰落和消亡，就和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保护适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存的社会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复杂的，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可喜的是，现在有不少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同志近来完成的《怀梆文化生态研究》可谓在这一领域值得重视的成果。

丁永祥同志对文化生态问题的关注可以说由来已久。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中国生态美学热中，丁永祥同志一直从事生态美学研究。2006 年，他从日本进修回来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把自己熟悉的生态美学与热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真可谓如鱼得水。丁永祥同志在攻读博士期间，潜心研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怀梆。在研究怀梆的过程中，他作了大量的调查，并深入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种扎实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真实、可靠的。在《怀梆文化生态研究》中，作者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讨论了怀梆的生存环境，指出了环境变化对怀梆发展的影响。同时，作者还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怀梆的内部生态机制，应该说，内部动因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怀梆文化生态研究》对怀梆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传承模式等的探讨很有见地，值得重视。

当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整体性保护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怀梆文化生态研究》从一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手，深入地讨论了整体保护问题，这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当前最紧迫

的需要之一就是加强调查研究。没有理论研究，很多问题就弄不清楚，保护工作就无法科学地进行。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希望永祥同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张庆善

2010年11月1日于北京

前 言

当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危亡的局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日趋衰败。研究和抢救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近年来，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怀梆是流行在以河南省古怀庆府地区（今焦作市为主）为中心的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2006 年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怀梆具有悠久的历史，曾深受群众喜爱，也曾极度辉煌，但今天它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怀梆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它有着自身的特色，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期望通过对怀梆的研究，找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规律，以为相应的保护提供帮助。

作者对怀梆的关注始于 2005 年。该年作者由所在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选送到日本立正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访学期间，作者对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感受颇深。日本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非常重视。在日本，作者看到，这里不仅有保护完好的古代建筑、遍布各地的古老神社寺庙，而且还有延续了几百年的民间文化节日。作者通过参加“熊谷祭”、“秩父祭”及立正大学学生“星霜祭”等活动发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很珍视。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地参加那些古老的节日活动。日本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是如此的珍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遭受巨大的破坏。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多

数都处于濒危的状态。如果现在我们不抓紧进行抢救，今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2006年作者回国之后即开始投入到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此时正赶上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兴起。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公示。我们在河南师范大学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带领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怀梆进行调查和研究。2006年6月在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我们指导的焦作市武陟县乔庙乡冯丈村农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经武陟县文化局批准正式成立。这里成了我们的研究实践基地。我们的研究工作由此全面展开。

为研究怀梆的发展规律和保护对策，我们先后对包括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山西在内的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怀梆流行的核心地区，如武陟、沁阳、博爱、孟县、温县、济源、修武等县我们做了重点调查。除了对怀梆进行调查之外，我们还对构成怀梆文化生态环境的其他民间文艺项目如豫剧、二股弦、哼小车、二夹弦、火神祭祀等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通过大量的调查，我们取得了丰富的材料，并收集整理怀梆剧本一百多本，摄录录像资料约五千多分钟，采访录音近万分钟。同时还收集了部分实物资料，如古代演出道具、服装、场记等。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还与不少怀梆艺人成了朋友。调查所获得的丰富资料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参与了具体的保护实践。2006年6月7日我们在焦作市武陟县乔庙乡冯丈村指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指导当地举办农民文化节、怀梆研讨会、怀梆擂台赛、哼小车比赛等活动。经过长期努力，冯丈村成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中心、教育中心和保护中心。2007年该村被河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特色文化村”。同时，我们还在河南师范大学指导成立了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大学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宣传、进校园等活动。2008年6月冯丈村和河南师范大学同时被河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我们的保护实践活动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河南日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大量的保护实践活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怀梆作为地方戏曲它流行的范围并不算很广，其影响也不算很大。

但作为独立的剧种，其文化个性是鲜明的。怀庆府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使这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我们称之为“怀文化圈”。相对独立的“怀文化圈”及其与怀梆所构成的生态关系，为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对象。通过对怀梆的研究，能够找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普遍规律，正是我们开展本研究的最终目的。

目 录

序	(1)
---------	-----

前言	(1)
----------	-----

第一章 文化生态学与怀梆文化生态研究

第一节 文化生态学	(1)
第二节 怀梆文化生态研究	(9)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研究	(9)
二 怀梆研究	(14)

第二章 怀梆的产生、发展及其审美特征

第一节 怀梆产生的地区和流行范围	(17)
一 怀庆府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17)
二 怀梆的流行范围	(23)
第二节 怀梆的产生和发展	(31)
一 怀梆的产生	(31)
二 怀梆的发展	(42)
三 怀梆的衰败	(54)
第三节 怀梆的审美特征	(59)
一 怀梆的音乐特征	(60)
二 怀梆的文学特征	(65)

第三章 怀庆府自然生态与怀梆发展

第一节	怀庆府的自然条件	(76)
一	怀庆府的气候	(76)
二	怀庆府的水土	(79)
三	怀庆府的景观	(85)
第二节	怀庆府的物产	(89)
一	怀庆府物产的概述	(89)
二	四大怀药	(92)
第三节	自然环境对怀梆发展的影响	(96)
一	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怀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97)
二	重要的交通位置促进了文化交流,带动了怀梆发展	(99)
三	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怀梆的艺术风格	(101)
四	优美的自然景观促进了怀梆发展	(102)

第四章 怀庆府社会生态与怀梆发展

第一节	怀庆府村社社会	(105)
一	村社结构及功能	(106)
二	怀庆府村社民俗	(109)
第二节	怀庆府民间信仰	(115)
一	民间信仰	(115)
二	祭祀活动	(129)
三	祭祀仪式与民间文艺的关系	(138)
第三节	怀商与怀梆	(151)
一	怀庆商帮	(151)
二	怀商对怀梆发展的影响	(160)

第五章 怀庆府文化生态与怀梆发展

第一节	怀文化圈	(165)
一	怀文化的界定	(166)
二	怀文化的特点	(169)
第二节	怀庆府多样共生的民间艺术	(180)
一	民间音乐	(181)
二	民间舞蹈	(183)
三	民间戏曲	(187)
第三节	共生生态中怀梆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193)
一	共生	(194)
二	竞生	(197)

第六章 怀梆内部生态机制

第一节	怀梆戏班发展的动力机制	(201)
一	怀梆戏班动力机制的形成	(202)
二	怀梆戏班发展的动力结构	(204)
第二节	怀梆戏班的运作模式	(213)
一	专业戏班的运作模式	(214)
二	业余戏班的运作模式	(220)
第三节	怀梆传承	(225)
一	怀梆传承的传统模式	(225)
二	传承机制变化与传承困境	(230)

第七章 怀梆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怀梆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形成原因	(235)
一	怀梆发展面临的困境	(236)
二	怀梆发展困境形成的原因	(244)

第二节	怀梆保护的意義、緊迫性和关键問題	(252)
一	怀梆保护的意義和緊迫性	(252)
二	怀梆保护的关键問題	(256)
第三节	由怀梆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260)
一	怀梆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260)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263)
结 论		(275)
一	环境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275)
二	民间艺术在实现民众的精神和谐中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277)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尊重客观规律,从环 境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	(278)
后 记		(280)

第一章

文化生态学与怀梆文化生态研究

从宏观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必然要运用文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生态学等。文化生态学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效的方法。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机的生态过程。它的生态机制、它与环境的关系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怀梆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败与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运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对怀梆进行研究，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怀梆发展的生态规律。不过，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应用还刚刚开始。当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研究已取得了部分成果，怀梆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但怀梆文化生态研究的成果目前还很少。

第一节 文化生态学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古今中外的文化研究者对文化曾下过无数的定义。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22—1917）最早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从一种广泛的人种学的意义上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所

有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① 泰勒的这个定义后来被人们不断丰富，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说：“它明显是种由各种工具、各种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体制特征，以及人类各种观念、技艺、信仰和习惯所组成的整体。”^② 马林诺夫斯基显然更重视社会群体体制、技艺等精神特征，并且指出了文化应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这比泰勒的定义要全面。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也有不少人下过定义，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③。而司马云杰则说：“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物质所构成的复合体。”^④ 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在此我们无意参加文化定义的讨论。我们大体沿用前人的定义，即认为文化是指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即如上所述，指人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创造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包含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即仅指精神成果。

人类自从有了文化以来，文化研究就成了一个重要课题。考察人类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学说多种多样，如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现象学等。20 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的学说——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文化生态学于 1955 年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 1902—1972）在他的《文化变迁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The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中首次提出。斯图尔德说：“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社会内部的变革或进化性变迁。文化生态学是在结合其他变迁过程的同时来分析这些适应

①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6 页。

② [英]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 页。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版，第 53 页。

④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 页。

的。这一研究方法要求对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内部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①文化生态学理论产生之后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理论受到了文化研究界的普遍重视，之后迅速发展逐渐成了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文化生态学产生的基础是德国生态学家 E. H. 海克尔 (E. H. Haeckel, 1834—1919) 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②。生态学把环境因素引入生物科学、把生命活动看做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的思想，给生物学研究带来了革命。随着生态学在生物学领域取得成功，它迅速扩展到了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与生态学相关的学科，如森林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水域生态学、行为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工业生态学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已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安全。1962 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逊 (R. Carson, 1907—1964) 的名著《寂静的春天》问世，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卡尔逊对农药等化学污染的忧虑促进了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环境问题逐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1972 年 6 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以及后来通过的《地球宪章》、《21 世纪议程》等多份文件标志着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环境的恶化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学的普遍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很多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于是就出现了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经济生态学、人口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文艺学，等等。生态学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为不同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生态”成了当代社会的关键词。

文化研究领域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早在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中国

① [美] 朱利安·H. 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②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 页。

古代经典《周易》中所提出的“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体现的就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环境思想。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中则包含着更丰富的生态思想。“儒家美学强调社会生态的平衡和稳定；道家美学思想强调自然的平衡和健康。”^① 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篇》），庄子的万物平等、重天然、天人合一等思想是至今世界各国学者都十分重视的生态思想。此外，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和而不同的精神，都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生态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古希腊时期，一些人文学者已早就注意到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将环境与社会体制相联系来研究社会体制产生的原因。16 世纪法国思想家 J. 博丹提出，地理环境决定国家的形式、民族的性格以及社会的发展。这在文化生态学上被称为地理决定论。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C. L. Montesquien, 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对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H. A. Taine, 1828—1893）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则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② 后来德国地理学家 F. 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美国地理学家 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等人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从而使环境决定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F. 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则指出，环境只是存在着影响文化的可能，并不是必然的决定因素，社会以及其他文化现象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之间的论争促进了文化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此外，社会进化论、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圈学派等也都从环境出发论述过文化模式、文化类型的形成。它们对文化生态学的形成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 陈伟、种海燕：《儒家社会生态美学思想与道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

②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